
是「異議」？還是「疏離」？
網路使用者的政治態度與政治參與

王嵩音*

摘要

本文依據「政治信任感」以及「政治效能感」將臺灣網路使用者區分為「忠誠者」、「異議者」、「從屬者」與「疏離者」，並探討四種政治態度類型的分布比例情形為何？不同類型的人口學特徵為何？不同類型的線上以及線下政治參與行為有何差異？政治態度類型和傳統媒介與非傳統媒介使用行為之關聯為何？結果顯示臺灣網路使用者中以「疏離者」人數最多，人數最少為「從屬者」。四種類型在教育程度以及政黨認同上有顯著差異。四種類型在常規性的投票行為方面並沒有顯著差異，但在其他的線上或線下政治參與行為都有顯著差異。其中「忠誠者」政治參與的頻率最高，「疏離者」政治參與的頻率則最低，「異議者」參與線下公民運動的頻率最高。研究也發現傳統媒介的使用行為並不能夠顯著預測政治態度類型，至於非傳統媒介則能顯著預測不同的政治態度類型。

關鍵詞：政治信任感、政治效能感、政治參與、網路使用者

*王嵩音為國立中正大學傳播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專任教授。聯絡方式：telsiw@ccu.edu.tw

壹、前言

民主政治的精髓就是公民積極參與政治以造就有效率的政府。在影響政治參與的因素當中，個人心理因素影響效果非常顯著。所謂態度決定行為，政治態度的傾向會影響民眾採取何種政治參與行為。社會學者甘姆森（W. Gamson）在 60 年代提出假說解釋為何美國民眾政治信任與投票意願降低而社會運動卻興起的原因。依據甘姆森假說（Gamson, 1968, 1971），政治信任的降低意味著政治疏離感增加，將會降低公民對於政治參與的興趣和行為。而觀察民眾的「政治信任感」（political trust）以及「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兩種政治態度將可以預測其政治參與的行為模式。如果個人擁有低度的政治信任感以及高度的政治效能感，意味著對於政治現狀不滿意，較傾向於參與較激烈的示威或抗議等社會運動以企圖改變現狀。這類民眾被稱為「異議者」（Dissidents）。第二種類型同時擁有高度的政治信感以及高度的政治效能感，被稱為是「忠誠者」（Assureds）。此類的民眾認為個人具有改變政府作為的能力（政治效能感高），比較會積極參與如投票等傳統的政治活動。第三種類型為政治信任感程度高但政治效能感程度低者，被稱為是「從屬者」（Subordinates）。他們信任政府但是不認為自身有能力影響政府作為，因此較不會積極參與政治。最後一種類型是屬於政治信感程度低而政治效能感程度也低的一群，被稱為「疏離者」（Alienateds）。此類民眾一方面認為政治不值得信任，另一方面又覺得自身沒有改變現狀的能力，因此感到悲觀且退縮。理論上「疏離者」是參與政治程度最低的類型。

學者進一步分析媒介使用與政治態度類型的關聯，發現傳統媒介使用者和網路媒介使用者對於政府的信任程度以及政治參與行為方面有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傳統媒介使用者對於政府的信任感較高也較會參與如選舉等常規性政治活動，也就是傾向「忠誠者」；反之，網路使用者則對於政府的信任感較低也較會參與示威或抗爭等非常規性的政治活動，也就是傾向「異議者」（Johnson, Kaye, & Kim, 2010）。其他研究則發現網路使用者比非使用者對於政治具有較高興趣，也較關注總統選舉（Johnson & Kaye, 1998）。研究也發現相對於 1996 年的美國網路使用者樣本，2000 年的樣本呈現出

更高的政治效能感，因此網路的使用可以顯著預測政治態度（Johnson & Kaye, 2003）。不過研究也指出網路使用者雖然擁有較高的政治效能感，但是卻傾向不信任政治（Johnson & Kaye, 2003；Kaye & Johnson, 2002）。因此頗值得針對網路使用者去驗證甘姆森假設。

近年來社交媒體如 Facebook 等發展快速。和傳統網路的社交平台如部落格或討論群等相比，社交媒體最大的特色在於用戶姓名（實名制）和訊息的真實性，可以強化社群凝聚力與認同，因此可以促進公民參與（Ellison, Steinfield, & Lampe, 2007；Gil de Zúñiga, Molyneux, & Zheng, 2014；Zhang, Johnson, Seltzerand, & Bichard, 2010）。此種新形式的社交媒體傳播是否可以動員更多的網路使用者進行線下的政治行動值得深入探究。2013 年 25 萬的「白衫軍」走上街頭，乃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由公民自發的社會運動。「白衫軍」主要透過網際網路（特別是台大批踢踢實業坊與 Facebook）串連，形成由網友網路串聯發起的新型態公民參與。2014 年反服貿「太陽花學運」的抗議民眾也是以 Facebook 作為訴求平台，並成立社團和粉絲專頁，提供不同於主流媒體的新聞資訊。此種線上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或動員進行線下的公民行動儼然形成最新政治參與模式（王嵩音，2017）。

甘姆森假設已歷經數十年，近年運用該理論於網路環境下之使用者也獲得驗證（Johnson & Kaye, 2013），但是多數相關研究乃針對的是在 Web1.0 網路環境下的觀察。例如 Johnson & Kaye（2013）兩位學者依據甘姆森假說調查美國網路使用者，發現四種政治態度類型中，以「異議者」和「忠誠者」的比例最多，分別占有 68.5% 和 31.5%。該研究比較兩種類型發現「異議者」傾向於採取非傳統方式（如抗議行動）參與政治，而「忠誠者」則傾向於使用傳統方式（如投票）參與政治。而研究也顯示兩種類型在媒體使用行為方面也有差異。「異議者」比較會使用非傳統線上媒體（如線上脫口秀節目），而「忠誠者」比較會使用傳統線上媒體（電視新聞網站）。上述研究最主要的研究限制為非隨機樣本，且僅比較「異議者」和「忠誠者」兩種類型，而在媒介使用行為方面也未探討近期頗受重視的社交媒體（social media）。

綜合上述，本研究試圖探討臺灣的網路使用者中四種政治態度類型的分布比例情形為何？不同類型的人口學特徵為何？不同類型的線上以及線下政治參與行為有何差異？另外在 Web2.0 環境下，強調互動、分享特性之社交媒體，是否會強化網民對於公共議題的涉入與討論，繼而提昇其政治態度。因此本研究除了探討傳統媒介與網路和政治態度類型的關聯，也將探討新興之社交媒體與政治態度類型之關聯。

貳、文獻探討

一、政治信任感與政治參與

Gambetta (1998) 認為信任是行為者評估其他單獨行為者或群體行為者將會進行特定行動的主觀看法，以評估他人的作為是有益還是有害。所謂的政治信任感是指民眾對於政府的信心，也是一種民眾對政府施政表現的評價。Easton (1975) 分別從政治面、制度面和文化面探討政治信任。政治面上，如果政府績效不彰，特別是民眾主觀的經濟評估及客觀的經濟數據，若資料數據顯示經濟表現不佳，會降低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制度面上探討政治過程中是否出現「民主缺失（逆差）」(democratic deficit)，如果有，將拉大公民與國家之間的鴻溝。而文化面上，則認為後工業社會鼓勵具批判性公民，從根本挑戰傳統權威。因此對於政治或政府的信任與民主化過程緊密相關。Gamson (1968) 提出類似看法，認為政治信任感是一般民眾即使不刻意監督政治體系也會產生出可欲的結果 (preferred outcomes)。當民眾對於政治權威具有相當程度信任時，會相信權威當局會遵守法律並為人民謀福利；相對地，當人民對於權威當局不信任時，他們給予執政者的自由裁量權相對會縮小，且會處處限制執政者，以確保自身利益不受到執政者侵犯 (Gamson, 1968:44-45)。

Easton (1975) 將政治信任分成兩種對於執政當局的支持 (political support)。其一為特定支持 (specific support)，指涉的是民眾對於政權當局政策產出的滿意度。政權當局包括了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以及政治人物等。另一為廣泛支持 (diffuse support)，指涉民眾對政治體系的支持。因此政治信任感的測量一般也區分為政治信任和政府信任。政治信任

針對的是普遍性的政治支持，包括民眾對於政府角色、政府政策與政府官員等的信任。而政府信任針對的是對於各種政治機構的信任。

學者們對於政治信任感的影響有不同的看法。Miller (1974) 認為政治信任感不足時，會引發民眾對政治制度與政權的不滿，並有可能導致激烈的政治行動或急速的政治變遷，進而影響政權存在的正當性。但是 Hetherington 卻認為人們會隨著不信任政府的同時，對於政治變得更加冷漠和消極反抗，抵制政府的決策行為，從而不再參與政治 (Hetherington, 1998)。Citrin (1974) 則認為政治信任感的衰退，可能只是對特定執政者不滿，而不是對於整個體制或社會的不支持。Mishler & Rose (1997) 也指出一個國家民眾的政治信任太高或太低都不好。太高的政治信任會讓民眾過度授權於政治人物，而失去了監督制衡的機制，而太低則不利於民主體制的維護。

陳陸輝 (2003) 運用臺灣從 1992 年到 2001 年的四次立委選舉調查資料分析，發現台灣民眾的政治信任感在 1992 年到 1998 年有顯著下降趨勢，但在政黨輪替後，又有回升的趨勢。有關政治信任感與政治參與行為的實證研究顯示，民眾政治信任感與其政治參與行為之間的關連有時顯著 (吳重禮、李世宏，2005；陳陸輝，2006；Almond & Verba, 1963)，有時不顯著 (Hooghe & Marien, 2013；Norris, 1999)，或者不同面向的政治信任度影響不同的政治參與行為 (Katsanidou & Eder, 2015)。研究也指出政治信任感是影響政治參與的必要但非充分因素，還要考量民眾的政治效能感 (Hooghe & Marien, 2013)。

二、政治效能感與政治參與

政治效能感 (political efficacy)，或稱「政治功效意識」。一直是政治學研究關注的概念 (Abramson, 1983；Abramson & Aldrich, 1982)。其定義為個人認為其政治行動對於政治過程能夠產生影響力的感知 (Campbell, Gurin, & Miller 1954)。政治效能感也被視為是民眾政治參與的一個預測指標。因此，政治學者通常認為政治功效意識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民眾政治參與行為，也會影響一個民主體制運作的正當性 (Rosenstone

& Hansen, 1993)。

政治效能感為一多元面向 (multidimensional) 的概念，可以分成兩個面向，一個面向是「內在政治效能感」(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而另一個則是「外在政治效能感」(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前者指的是個人自認為有能力瞭解和有效參與政治的信念，也就是個人認為自己是否對於政治過程有影響能力的認知；後者則是指個人對於政府回應其需求的信念，也就是個人和政治體制互動過程中是否能獲得回應的感受 (Converse, 1972; Craig & Maggiotto, 1982)。實證研究發現臺灣民眾的內在政治效能感與政治知識有關，而且呈現長期穩定的趨勢，而外在政治效能感則是在政黨輪替後明顯提高，顯示民眾對於政治體系回應力的感受有增強 (陳義彥、陳陸輝，2002；黃信豪，2005，2006)。

政治效能感乃衡量政治態度的重要概念之一，並常與政治參與行為一起被探究兩者之間的關聯。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相關研究均顯示政治效能感對於政治參與行為尤其是投票行為有正向的影響，也就是說，當民眾的政治效能感愈高時，他們愈會認為和政治體系的聯繫很密切，參與政治的程度也就愈高 (陳陸輝、耿曙，2008；Jung, Kim, & Gil de Zúñiga, 2011；Tian, 2011；Wolfsfeld, 1986)。

三、政治態度類型與政治參與行為

依據甘姆森假說，從民眾的政治信任感之高、低程度，以及政治效能感高、低程度可以分類成四種政治態度類型，而不同的態度類型在政治參與的程度上以及參與的類型上會有差異。政治參與所涵蓋的面向通常區分為常規性 (conventional) 與非常規性 (unconventional) 政治參與。所謂常規性指的是透過常設的、經常性的政治參與管道，例如政黨與選舉等。至於非常規性的政治參與指的是示威、遊行、集會等非經常性的集體行動和意見表達。表一列出依據政治信任感高低以及政治效能感高低所結構出的四種政治態度類型，並分述四種類型可能的政治參與行為 (Bandura, 1982；Gamson, 1968, 1971；Paige, 1971)：

表一：政治態度類型

		政治信任感	
		高	低
政治效能感	高	忠誠者	異議者
	低	從屬者	疏離者

資料來源：“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riot participation,” by J. M. Paige, 197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5):812.

（一）忠誠者

忠誠者對於政治的信任感高，也認為自身有影響政治的能力，會比較積極地參與常規性的政治活動，但較不會參與非常規性的政治活動。

（二）從屬者

從屬者對於政治的信任感高，卻不認為自己有改變政治的能力，因此較不會積極的參與政治，無論是常規性或非常規性的政治活動。

（三）異議者

異議者認為自己有能力影響政治，但是對於政治不信任，除了透過常規性方式參與政治，當無法從正式管道得到政府回應，就可能以非常規性方式以達成其訴求。

（四）疏離者

疏離者就是對於政治冷漠的族群。他們既對於政治信任度低，也認為自己沒有影響政治的能力，因此就會對於政治失去興趣，甚至迴避無論是常規性或非常規性的政治活動。

國外近年研究顯示，「忠誠者」多半政黨屬性堅強，並對於政治具有高度興趣。相反地，「異議者」則是教育程度較低，政黨屬性較弱，對於選舉等常規性政治活動較不熱衷。「忠誠者」也較「異議者」更有保守傾向（Johnson, Kaye, & Kim, 2010）。此外有關社會異議和抗爭人士的研究指出，當他們走上街頭進行抗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認為有能力可以促使政

治或社會變遷，也就是具備高度的政治效能感（Van Stekelenburg & Klandermans, 2013）。而針對網路使用者進行的調查也顯示「異議者」比「忠誠者」更傾向去抗議政府，而「忠誠者」則比「異議者」較會參與選舉等常規性的政治活動（Johnson & Kaye, 2013）。

國內相關研究並不多，其中江文孝（2005）以 2001 年之全國性樣本為調查對象，發現四種類型中以「忠誠者」人數最多，依序為「疏離者」、「異議者」、「從屬者」。該研究也發現「忠誠者」和「異議者」參與常規性政治活動的比例高於疏離者和從屬者，但在非常規性政治參與行為則無顯著差異。另有選舉相關研究（徐火炎，2003）則將「忠誠者」稱為「認同的選民」，「異議者」稱為「憤世的選民」，「從屬者」稱為「冷漠的選民」，「疏離者」稱為「疏離的選民」。四種政治疏離感選民的比例在 2001 年以認同選民與疏離選民的比例最高，各佔三成左右，而憤世選民的比例則為 22.6%，比例最少的為冷漠選民，僅一成五左右。在 2004 年期間，認同選民比例則是下降近 9 個百分點；相反的，疏離選民比例則是上升 9.5 個百分點。研究也發現無論是 2001 年或 2004 年的資料，四種疏離感選民的投票參與行為並沒有很明顯的差異性（葉子豪，2006）。上述研究顯示國內外的研究發現並不一致，頗值得進一步剖析。

再者，過往文獻多以探討線下的政治參與行為為主，卻忽略了在網路科技日異成熟的影響之下，已改變了民主實踐的方式。而以網路科技作為強化政府與公民之間，或公民與公民之間溝通與互動的管道已成了必然之趨勢，意即電子化的政治參與。公民可以透過網路蒐集政治資訊、參與線上公共論壇的討論，或者參與線上連署或投票等。本研究因此將政治參與行為區分為線上和線下的參與以彌補文獻之不足。依據上述文獻，本研究進一步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假設一：不同的政治態度類型在線上和線下政治參與行為會有差異。

假設二：「忠誠者」在四種類型中政治參與的程度會最高，而「疏離者」政治參與的程度則最低。

假設三：「忠誠者」參與常規性政治活動程度最高，而「異議者」參與非常規政治活動程度最高。

四、媒介使用與政治態度

傳播學者 Lasswell (1948) 從功能論的角度，提出傳播媒介做為社會的次系統，擔任了三大社會功能：(1) 守望環境，蒐集和傳遞各種消息；(2) 聯繫社會各系統對於環境的回應，並提出解決的策略；(3) 社會文化傳統的世代傳遞。因此傳播媒介在資訊的提供和傳遞上舉足輕重，不但提供公民所需資訊，提升其對於公共事務的興趣，更進一步會影響其態度和行為。傳統媒介、網路與社交媒體和政治態度的相關文獻分別敘述如下。

(一) 傳統媒介與政治態度

針對電視與報紙等傳統媒介所做之研究文獻顯示，報紙會直接影響民眾的政治知識程度與政治效能感，並間接影響政治的參與行為 (Eveland & Scheufele, 2000)。收看電視與報紙的公共事務報導數量頻率愈高，政治參與程度愈高。其中報紙的影響又比電視大，閱讀報紙硬性新聞與政治參與具有最強的關連性，且高於電視新聞的使用 (Chaffee & Kanihan, 1997; McLeod et al., 1996; Nisbet & Scheufele, 2004)。有研究進一步發現媒體使用會強化選民的政治效能感以及政治知識，因此促使其更願意參與選舉相關活動。例如 Robinson & Levy (1986) 的研究發現新聞媒介使用的頻率愈高，政治知識愈高，而且報紙新聞對政治知識的影響也比電視新聞大。研究也發現報紙與電視更能預測政治信任 (Avery, 2009)。在傳統媒介使用與政治態度類型關聯方面，研究發現傳統媒介使用者比較會參與常規性政治活動，而其在政治態度上傾向屬於「忠誠者」之類型 (Johnson & Kaye, 2013)。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四如下：

假設四：傳統媒介使用可以預測不同政治態度類型。

(二) 網路

網路作為新媒體促進公民政治參與的功能曾引發學術界的高度重視與討論。「動員學派」認為網路可以激發民眾對於選舉活動的參與。網路的便利性與互動性也可強化民眾對於公共議題的討論與參與，因而促進直接民主的實踐。尤其是網路使用者以年輕族群居多，學者進而關心網路是否可

以影響年輕族群，提高對於政治的興趣與參與。相關實證文獻則呈現不一致的結果。學者 Lee (2006) 認為網路可以降低政治參與的門檻，讓網民可以較容易接觸到政治菁英和組織，也因此會提昇政治效能感。而 Kensi & Stroud (2006) 兩位學者分析美國 2000 年總統選舉資料，也發現網路使用和政治效能感具有正向關係。不過別的研究則發現網路政治性資訊使用與政治效能感並沒有關聯，而娛樂性資訊使用甚至和政治效能感為負相關 (Scheufele & Nisbet, 2002)。相對於傳統媒介，網路則較易集結對於現狀不滿意的族群，且可能愈加強化其反體制意識。因此網路使用者傾向於擁有較低的政治信任感 (Sweetser & Kaid, 2008)，也比較會參與非常規性的政治活動，而在政治態度上傾向屬於「異議者」的類型 (Johnson & Kaye, 2013)。依據上述，本研究提出假設五如下：

假設五：網路使用可以預測不同政治態度類型。

(三) 社交媒體

隨著 Web2.0 架構逐漸成熟，各種型式社交媒體 (social media) 如雨後春筍般迅速發展。社交媒體最大的特色在於用戶姓名 (實名制) 和訊息的真實性以及互動形式，可強化人際關係以及訊息的傳遞，例如從好友的連結分享和留言接觸到政治的動員訊息，可能會刺激實際政治行動。國外已有研究發現社交媒體對於公民參與有正面影響 (Ellison, Steinfield, & Lampe, 2007; Gil de Zúñiga, Molyneux, & Zheng, 2014; Zhang, Johnson, Seltzer, & Bichard, 2010)。Baumgartner & Morris (2010) 發現青少年從社交媒體獲得的政治資訊越多，越會傳遞政治性電子郵件、參與線上請願活動等政治參與行為，但是並不會增加投票、簽名請願以及杯葛行為。Pasek, More, & Romer (2009) 則發現政治性使用社交媒體會顯著增加線下的政治參與行為。Valenzuela (2013) 針對智利民眾調查發現社交媒體的使用可顯著預測示威抗議等非常規性活動的參與。不過學者 (Kushin & Yamamoto, 2010) 分析美國大學生在 2008 年總統選舉期間使用網路新媒體的情況發現，社交媒體的使用和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參與並沒有顯著關連。另有研究則顯示使用 Youtube 的競選頻道和政治犬儒主義為正向相關，而使用候選人 Facebook 越頻繁則投票意願越高 (Towner & Dulio, 2011)。這顯示不同

社交媒體可能產生的影響並不一致。依據上述，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六：社交媒體使用行為可以預測不同政治態度類型。

上述假設中傳統媒介主要指的是報紙、雜誌、廣播和電視；而社交媒體則針對使用量最高的臉書和 Youtube 為主。

參、研究方法

一、樣本

本研究運用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一期第四次在 2015 年進行之全國性調查資料作為分析對象。調查計畫是以臺灣地區年滿十八歲及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86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者）為研究母體，並以門牌地址為抽樣名冊（sampling frame），利用分層等機率四階段抽樣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抽出受訪對象。為檢視正式調查的抽出樣本之代表性，利用內政部所提供之人口統計資料進行不等機率權值進行加權後樣本代表性檢定，卡方檢定結果得知抽出的樣本特徵與母體特徵均無顯著差異，表示樣本具有代表性。最後實際完成樣本數為 2002 人，其中網路使用者人數佔 73.4%，計 1470 人。本研究之重點之一為線上的政治性使用行為以及政治參與行為，因此將以 1470 網路使用者為對象進行資料分析。

在樣本的基本資料方面，受訪網路使用者中，男性有 751 人，佔 51.1%，女性則有 718 人，佔 48.9%。其平均年齡為 39.6 歲，而以 30 歲至 39 歲人數最多（394 人，26.8%），依序為 40 至 49 歲（330 人，22.5%）、20 至 29 歲（323 人，22.0%）、50 至 59 歲（239 人，16.3%）。至於在教育程度上，大專教育程度的比例超過半數（794 人，54.0%），其次為高中程度（428 人，29.1%）、大專以上（127 人，8.7%）、國中以下（120 人，8.2%）。

二、變數測量

（一）政治態度

本研究以三個李克特五等隔量表題項測量政治效能感：「我們一般民眾對政府的作為，沒有任何影響力」、「政府官員不會在乎我們一般民眾的想

法」、「政治有時候太複雜了，所以我們一般民眾實在搞不懂」。這三個題項實際上包含了一個題項測量的內在效能感（太複雜），以及二個題項的外在效能感（沒影響、不在乎）。過往相關研究有使用內在效能感，也有使用外在效能感或是合併使用。本研究考量測量內在效能僅一個題項恐有所不足，並經過效度的檢測後，決定採取合併三題為政治效能感的測量。另外以二個李克特五等隔量表題項測量政治信任感：「政府會為全民謀求最大的福利」、「政府首長在媒體上所說的話是可以相信的」。表二呈現二個政治態度變項的效度和信度檢測，兩者之 Cronbach's α 信度值分別為 0.60 和 0.71，均達非常可信的程度。題項加總後政治效能感（反向計分）平均值為 2.83，而政治信任感平均值為 2.53（表二）。

表二：政治態度之因素分析與信度測試

政治態度	因素命名	
	政治信任度	政治效能感
政府會為全民謀求最大的福利	0.87	-0.02
政府首長在媒體上所說的話是可以相信的	0.85	-0.11
有人說：「我們一般民眾對政府的作為，沒有任何影響力」，請問你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0.17	0.80
有人說：「政府官員不會在乎我們一般民眾的想法」，請問你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0.20	0.71
有人說：「政治有時候太複雜了，所以我們一般民眾實在搞不懂」，請問你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0.40	0.68
特徵值	1.69	1.63
解釋變異量	33.87%	32.66%
總解釋變異量	66.54%	
平均值	2.53	2.83
標準差	0.88	0.77
Cronbach's α	0.71	0.60
Total Cronbach's α	0.62	

註 1：表中各因素內的數值為因素負荷量。資料來源：「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一期四次調查」

(二) 媒介使用

有關媒介使用的研究，傳統上的測量為詢問受訪者透過各種媒體接收政治和公共事務頻繁的程度為何。本研究測量媒介使用頻率的七個題項如下，其中前四個題項測量傳統媒介使用行為，以加總後成為「傳統媒介使用行為」(Cronbach's $\alpha = 0.66$; $M = 2.88$, $SD = 0.77$)，第五個題項測量網路使用行為，也是「非傳統媒介使用行為」，而最後兩個題項則測量目前使用率最高的兩種社交媒體使用行為：

- (1) 請問你透過報紙接收政治和公共事務的頻率是？($M = 2.97$, $SD = 0.84$)
- (2) 請問你透過雜誌接收政治和公共事務的頻率是？($M = 2.28$, $SD = 0.81$)
- (3) 請問你透過廣播接收政治和公共事務的頻率是？($M = 2.53$, $SD = 0.89$)
- (4) 請問你透過電視接收政治和公共事務的頻率是？($M = 3.22$, $SD = 0.86$)
- (5) 請問你透過網路 (包含手機、平板、傳統電腦等) 接收政治和公共事務的頻率是？($M = 2.93$, $SD = 0.982$)
- (6) 請問你透過臉書接收政治和公共事務的頻率是？($M = 2.53$, $SD = 0.98$)
- (7) 請問你透過 Youtube 接收政治和公共事務的頻率是？($M = 1.94$, $SD = 0.96$)

受訪者回答的方式分為：從來不看、很少看、有時看、經常看。

(三) 政治參與

在政治參與行為的測量方面，本研究區分為線上與線下常規性與非常規性政治參與行為，並以選舉參與測量常規性政治參與行為。在題項設計上是詢問受訪者：

請問去年 (2014 年 11 月 29 日) 舉行的「縣市長選舉」，您有沒有去投票？

(01) 有 (N=1045, 71.1%) (02) 沒有 (N = 396, 26.9%)

本研究另外以三個題項加總 (Cronbach's $\alpha = 0.75$; $M = 1.55$, $SD = 0.62$) 測量受訪者線上的選舉參與行為如下：

請問你最近一個月內多常在網站上作下列和選舉有關的事情？

1. 「觀看、蒐尋或瀏覽」選舉新聞、訊息、影片 ($M = 2.06$, $SD = 1.02$)

2. 「分享、轉貼或轉寄」選舉新聞、訊息、影片 ($M = 1.35, SD = 0.69$)

3. 「發文、製作或評論」選舉新聞、訊息、影片 ($M = 1.23, SD = 0.56$)

受訪者回答的方式為：從來沒有、很少、有時、經常。

本研究以參與公民運動測量線下非常規性政治參與行為。在題項設計上是詢問受訪者：

請問你過去一年多常到現場參加公民運動（例如：臺灣同志遊行、反課綱、太陽花學運等）？ ($M = 1.14, SD = 0.47$)

受訪者回答的方式為：從來沒有、很少、有時、經常。

本研究另以一個題項測量線上非常規性政治參與行為。在題項設計上是詢問受訪者：

請問你過去一年多常在網路平台上簽署網路版的請願書？ ($M = 1.20, SD = 0.53$)

受訪者回答的方式為：從來沒有、很少、有時、經常。

(四) 人口學變項

人口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政黨認同（分為泛綠政黨認同、泛藍政黨認同以及無政黨認同三個類別）。

肆、資料分析

一、政治態度類型分析

依據「政治信任感」以及「政治效能感」之平均值區分為高度和低度後進行交叉相加獲得四種類型。結果顯示台灣網路使用者中以「疏離者」人數最多，佔 35.7% (525 人)；其次是「忠誠者」，佔 25.8% (380 人)，「異議者」，佔 22.3% (328 人)。人數最少為「從屬者」，佔 16.2% (238 人)。

接著分析四種類型在人口學特徵的差異。結果顯示四種類型無論在性別或年齡方面皆無顯著差異。而在教育程度方面，「忠誠者」和「異議者」在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比例較「疏離者」和「從屬者」高。而「疏離者」和「從屬者」在高中以下教育程度的比例則較「忠誠者」和「異議者」高

(表三)。在政黨傾向方面，所有類型皆以無政黨認同傾向比例最高，不過「疏離者」中泛綠認同傾向者佔較多數，而「忠誠者」則以泛藍認同傾向者佔較多數(表四)。

表三：四種類型與教育程度交叉表

	疏離者	從屬者	異議者	忠誠者	總和
國中以下	52 (9.9%) (43.3%)	28 (11.8%) (23.3%)	16 (4.9%) (13.3%)	24 (6.3%) (20.0%)	120
高中	188 (35.7%) (43.3%)	74 (31.1%) (17.2%)	90 (27.4%) (21.0%)	77 (20.3%) (17.9%)	429
大專	251 (47.7%) (31.6%)	126 (52.9%) (15.8%)	183 (55.8%) (23.0%)	235 (62.0%) (29.6%)	795
大專以上	35 (6.7%) (27.6%)	10 (4.2%) (7.9%)	39 (11.9%) (30.7%)	43 (11.3%) (33.9%)	127
總和	526	238	328	379	1471

$\chi^2 (9, N=1471) = 53.846; P < 0.001$

資料來源：「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一期四次調查」

表四：四種類型與政黨傾向交叉表

	疏離者	從屬者	異議者	忠誠者	總和
泛藍認同	80 (15.2%)	56 (23.5%)	68 (20.8%)	126 (33.2%)	330
泛綠認同	163 (31.0%)	59 (24.8%)	91 (27.8%)	79 (20.8%)	392
無政黨認同	282 (53.7%)	123 (51.7%)	168 (51.4%)	175 (46.1%)	748
總和	525	238	327	380	1470

$\chi^2 (9, N=1470) = 43.890; P < 0.001$

資料來源：「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一期四次調查」

二、政治態度類型與政治參與行為

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四種類型在線下的投票行為方面並沒有顯著差異。臺灣歷年投票率偏高，無論何種政治態度類型有投票的比例皆 7 成以上。至於線上選舉參與行為，「忠誠者」顯著高於「疏離者」(表五)。

表五：四種政治態度類型線上選舉參與行為單因子變異數差異比較

	平均數	標準差	樣本數	統計檢定	事後比較
1.疏離者	1.45	0.57	525	$F(3,1465)$	4>1
2.從屬者	1.55	0.61	238	=8.705	
3.異議者	1.57	0.62	328	$P<0.001$	
4.忠誠者	1.66	0.65	380		

資料來源：「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一期四次調查」

至於四種政治態度類型在線下非常規性政治參與行為的差異比較方面，資料顯示「異議者」過去一年到現場參加公民運動的頻率顯著高於「疏離者」和「從屬者」（表六）。

表六：四種政治態度類型公民運動參與行為之單因子變異數差異比較

	平均數	標準差	樣本數	統計檢定	事後比較
1.疏離者	1.09	0.37	525	$F(3,1465)$	3>1
2.從屬者	1.12	0.45	238	=7.163	3>2
3.異議者	1.23	0.55	328	$P<0.001$	
4.忠誠者	1.16	0.51	380		

資料來源：「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一期四次調查」

四種政治態度類型在線上非常規性政治參與行為也呈現差異。資料顯示「忠誠者」和「異議者」簽署網路版請願書的頻率顯著高於「疏離者」和「從屬者」。

表七：四種政治態度類型簽署網路版請願書之單因子變異數差異比較

	平均數	標準差	樣本數	統計檢定	事後比較
1.疏離者	1.13	0.57	525	$F(3,1465)$	3>1
2.從屬者	1.13	0.61	238	=10.457	3>2
3.異議者	1.57	0.62	328	$P<0.001$	4>1
4.忠誠者	1.66	0.65	380		4>2

資料來源：「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一期四次調查」

上述結果顯示假設一獲得部分支持。四種類型在常規性的投票行為方面並沒有顯著差異，但在其他的線上或線下政治參與行為都有顯著差異。其中「忠誠者」在四種類型中政治參與的頻率最高，而「疏離者」政治參與的頻率則最低，因此假設二獲得支持。再者，「忠誠者」參與線上常規性政治活動以及線上非常規性政治活動的頻率均為最高，「異議者」參與線下公民運動的頻率最高，而「疏離者」是四種態度類型中無論是線上或線下政治參與頻率最低者。假設三也獲得支持。

三、媒介使用行為與政治態度類型

本研究運用「多元羅吉斯迴歸模型」檢驗媒介使用行為對於政治態度類型的預測情況。模型中的依變數是四種政治態度類型。因其為類別變數，故以「疏離者」為對照組。模型中的預測變數則有三組變項。第一組為人口學變項，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政黨認同。第二組為傳統媒介使用行為，由四種傳統媒介（報紙、雜誌、廣播、電視）使用頻率加總為一個變數。第三組為非傳統媒介使用行為，包含網路、臉書與 Youtube 等三種媒介的使用頻率。

分析結果顯示，在模式的適配度方面，Pearson 卡方值顯著性 $P = 0.063 > .05$ ，而離差卡方值顯著性 $P = 1.000 > .05$ ，均呈現包含所有預測變項的完全模型適配度良好。至於在個別預測變項的顯著性檢定方面，為避免第一類錯誤採取顯著水準為 $\alpha = .05/8 = 0.00625$ 。在八個預測變項中有三個預測變項的預測力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分別為教育程度 ($\chi^2 = 22.39, P = 0.000 < 0.00625$)、政黨認同 ($\chi^2 = 27.82, P = 0.000 < 0.00625$)、Youtube 使用行為 ($\chi^2 = 12.55, P = 0.0060 < 0.00625$)。

表八呈現各個預測變項在三種政治態度類型與對照之「疏離者」類型的顯著性檢定以及勝算比值 (Exp(B))。首先在從屬者方面，所有的預測變項都未達顯著水準，也顯示人口學變項與媒介使用變項都無法區分「從屬者」與「疏離者」。在「異議者」方面，教育程度達顯著水準，且為正向。因此教育程度可以有效區分「異議者」和「疏離者」(勝算比值 = 1.418)，受訪者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個單位，為「異議者」的勝算機率就增加 41.8%。

至於「忠誠者」方面，人口學變項中教育程度和政黨認同都達到顯著水準。教育程度也可以顯著區分「忠誠者」和「疏離者」（勝算比值=1.518），受訪者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個單位，為忠誠者的勝算機率就增加 51.8%。而泛藍認同者為「忠誠者」較「疏離者」高 2.166 倍。至於傳統媒介使用在模式中並不是有效的預測變項，意即傳統媒介的使用行為並無法有效區分四種政治態度類型。而非傳統媒介以及社交媒體使用行為都可以顯著預測「忠誠者」和「疏離者」。網路使用頻率每增加一個單位為「忠誠者」的勝算機率就增加 39.1%。Youtube 使用頻率每增加一個單位為「忠誠者」的勝算機率就增加 38.5%。但是臉書使用頻率每增加一個單位為「忠誠者」的勝算機率就減少 19.8%。

表八：四種政治態度類型多元對數成敗比模型（以疏離者為對照組）

	從屬者		異議者		忠誠者	
	B	Exp(B)	B	Exp(B)	B	Exp(B)
性別	-0.039	0.962	0.022	1.023	0.215	1.240
年齡	0.005	1.005	0.005	1.005	0.005	1.005
教育程度	-0.047	0.954	0.349**	1.418	0.418***	1.518
泛藍認同	0.269	1.308	0.226	1.254	0.773***	2.166
泛綠認同	-0.329	0.719	-0.086	0.918	-0.316	0.729
傳統媒介使用	-0.132	0.876	-0.065	0.938	-0.068	0.934
網路使用	0.081	1.031	0.099	1.104	0.330**	1.391
臉書使用	-0.014	0.986	0.040	1.041	-0.221*	0.802
Youtube 使用	0.163	1.177	0.105	1.110	0.326***	1.385

說明：*： $p < .05$ ，**： $p < .01$ ，***： $p < .001$ 。Pseudo $R^2=0.076$

資料來源：「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一期四次調查」

上述結果顯示假設四未獲支持。傳統媒介使用行為並無法預測政治態度類型。而網路使用行為則可以顯著預測政治態度類型。社交媒體（臉書和 Youtube）使用行為也可以顯著預測政治態度類型，因此假設五和假設六獲得支持。

伍、討論

臺灣網路使用者是「異議者」還是「疏離者」？經本研究資料分析顯示，比例最高的是「疏離者」，約佔三成六，其次是「忠誠者」，約佔二成六。「異議者」比例接近「忠誠者」，佔二成二。人數比例最少的是「從屬者」，約佔一成六。其他研究已發現臺灣疏離民眾的比例有增加趨勢（葉子豪，2006）。Gamson 的假說產生即著眼於探討美國民眾投票率降低的因素，認為「疏離者」對於政治不熱衷，而對於無論是常規性或非非常規性的政治活動的參與意願也低。疏離者也可能會對於執政當權者不滿意或對於政治體制不支持（Easton,1975）。如果一個國家疏離民眾過多，有可能危及執政者的正當性，甚至導致政局的崩潰。因此對於「疏離者」的人數比例多寡的確需要正視。

資料分析顯示四種政治態度類型在人口學變項中之性別和年齡無差異，但在教育程度和政黨認同上則有顯著差異。「疏離者」和「從屬者」高中以下教育程度的比例較高，而「忠誠者」和「異議者」則以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比例較高。此現象和國內外文獻一致。教育程度較高者對於公共事務具有較高的認知，也對自己的政治影響力較具有信心，因此「忠誠者」和「異議者」的比例也較高。至於政黨認同方面，資料顯示「疏離者」中泛綠認同傾向者佔較多數，而「忠誠者」則以泛藍認同傾向者佔較多數。這和 2001 年調查顯示「疏離者」中泛藍認同傾向者佔較多數，而「忠誠者」則以泛綠認同傾向者佔較多數正好相反（江文孝，2005），顯然是與調查當時的執政政黨有關。當民進黨執政時，泛綠認同民眾較信任民進黨政府，因此「忠誠者」較多數為泛綠認同傾向，而「疏離者」為泛藍認同傾向；而當國民黨執政時，泛藍認同民眾較信任國民黨政府，因此「忠誠者」為泛藍認同傾向，而「疏離者」為泛綠認同傾向。未來可繼續觀察此現象是否即為臺灣政黨輪替政治情境下之常態。

過往相關研究在探討政治態度的政治後果均以線下的政治活動為主。本研究則認為在網路使用普及的情況下，民眾參與線上的政治活動可能愈加頻繁，因此應同時探討線上與線下的政治參與行為。經以網路使用者為

調查對象發四種政治態度類型在常規性的選舉投票行為上並沒有差異，四種類型都有七成以上的投票率。這應該與臺灣的選舉投票率偏高有關。不過本研究在常規性的選舉參與測量題項太少，沒有測量如參加選舉造勢活動、擔任助選工作、討論選舉議題或捐錢給候選人等各種選舉參與行為，並無法充分代表常規性政治參與。至於四種政治態度類型在線上常規性政治參與以及線上、線下非常規性政治參與行為都呈現顯著差異且符合假設。「疏離者」是四種類型中政治參與程度最低者，「忠誠者」則是四種類型中政治參與程度最高者，而「異議者」實際走上街頭參與公民運動的頻率是四種政治態度類型中最高者。此結果驗證了個人政治態度的確決定其採取何種方式參與政治以及參與程度。這也呼應社會抗爭運動之理論（王鼎銘，2015；Van Stekelenburg & Klandermans, 2010）。文獻認為可以從二個理論分析民眾參與抗爭活動的促因，其一為怨懟理論（grievance theory），也就是民眾對於政府施政感到不滿意，或者認為遭遇到不公平待遇（Klandermans, 1997）產生相對剝奪感（Folger, 1986），因而走上街頭參與抗爭活動。其二為效能感理論（efficacy theory），則是抗議者有自信認為透過參與抗爭行為是可能改變現狀，並平反其不公平待遇（Klandermans, 1997）。這或許可以部分解釋民眾參與近年各項公民或社會運動的原因。

本研究也針對媒介使用行為與政治態度類型之間關係作分析。研究發現傳統媒介的使用行為並不能夠顯著預測政治態度類型。雖然傳統媒介中之電視依然是所有類型使用頻率最高的媒介，卻無法預測不同的政治態度類型。至於非傳統媒介則均能顯著預測不同的政治態度類型，其中透過網路或 Youtube 接收政治或公共事務的頻率最能顯著地區分「忠誠者」與「疏離者」。這也彰顯了現今科技突飛猛進情況下，社交媒體在民眾接觸政治與公共事務資訊上的重要性。國外研究發現不同的社交媒體所產生的影響會有差異。Facebook 使用者對於政府的信任度較高（Kushin & Yamamoto, 2010），可能因為線上較親密的互動性讓使用者可以擁有對於政治資訊較多的控制權。而民眾在 Facebook 上和其他網友以及政治人物之間會有較多的互動情形，會強化政治參與和提高政府信任。不過 Youtube 又是不一樣的情況。任何人包括素人、政治人物或媒體都可以在 Youtube 上製作和分

享影片。對於信任的正面影響是民眾可在 Youtube 觀賞不受到守門檢查的政治實況，因而提升對於政府的信任。民眾在選舉期間也可以透過 Youtube 接觸到候選人的宣傳影片，強化支持率以及提高投票率因而提升對於政治人物的信任。不過民眾也同樣有機會從 Youtube 上接觸到競選對手抹黑的影片或是對於政治人物嘲諷的影片，因而可能增加犬儒心態，降低政治信任感 (Towner & Dulio 2011)。本研究結果顯示臉書使用的影響不大，但是透過 Youtube 接收政治資訊的頻率可以正向預測「忠誠者」，卻是負向預測「疏離者」。不過本研究是調查在非選舉期間使用情形，建議未來可針對選舉期間 Youtube 的使用行為探究。

在研究限制方面，本研究乃採取二手分析資料，因此受限於調查資料庫的問卷題項。許多概念的測量雖然在效、信度方面達到標準但仍嫌不夠完整。例如政治效能感並沒有區分內在或外在效能感，而常規性與非常規性政治參與行為都僅能使用單一題項測量等。這都可能限制了資料的分析或導致結果不佳。此外，雖然「政治信任感」以及「政治效能感」的確為兩個影響政治參與行為的重要因素，但是不可否認還有其他的政治態度變項同樣會影響政治參與行為，譬如政治興趣、政治意識型態等。建議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去加以探討。

參考文獻

- 王嵩音 (2017)。〈社交媒體政治性使用行為與公民參與之研究〉，《資訊社會研究》，32：83-112。
- 王鼎銘 (2015)。〈抗爭行為的集體行動邏輯：「反貪倒扁運動」之理性選擇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7 (4)：605-640。
- 江文孝 (2005)。《政治疏離感對民眾政治參與的影響》。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重禮、李世宏 (2005)。〈政治賦權、族群團體與政治參與：2001 年縣市長選舉客家族群的政治信任與投票參與〉，《選舉研究》，12(1)：69-115。
- 徐火炎 (2003.10)。〈臺灣政治轉型中的政治疏離感：從分析 2002 年北高兩的市長選舉資料結果來看〉，「2003 年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臺灣，台北。
- 黃信豪 (2005)。〈臺灣民眾政治功效意識的持續與變遷：政黨輪替前後的分析〉，《選舉研究》，12 (2)：111-147。
- 黃信豪 (2006)。〈政治功效意識的行動效果：1998-2003〉，《臺灣民主季刊》，3 (2)：119-158。
- 陳義彥、陳陸輝 (2002.10)。〈政治功效意識、政治信任感以及臺灣選民的民主價值〉，「2002 年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臺灣，臺北。
- 陳陸輝、耿曙 (2008)。〈政治效能感與政黨認同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以 2002 年北市長選舉為例〉，《臺灣民主季刊》，5 (1)：87-118。
- 陳陸輝 (2006)。〈政治信任的政治後果：以 2004 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臺灣民主季刊》，3 (2)：39-62。
- 葉子豪 (2006)。《臺灣選民的政治疏離感：以 2001 年與 2004 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東吳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Abramson, P. R. (1983). *Political attitudes in American: Formation and change*. San Francisco: WH Freeman and Company Press.
- Abramson, P. R., & Aldrich, J. H. (1982). The decline of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6(3), 502-521.

- Almond, G. A., & Verba, S. (1963). *The civic culture*.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very, J. M. (2009). Videomalaise or virtuous circle?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s media on political tru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4(4),410-443.
- Bandura, A. (1982). Self-efficacy mechanism in human agency. *Psychologist*, 37(2), 122-147.
- Baumgartner, J. C., & Morris, J. C. (2010). FaceTube politics social networking web sites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of young adults.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8(1), 24-44.
- Campbell, A., Gurin, G., & Miller, W. E. (1954). *The voter decides*. Evanston, IL: Row, Peterson.
- Chaffee, S. H., & Kanihan, S. F. (1997). Learning about politics from the mass medi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4(4), 421-430.
- Citrin, J. (1974). Comment: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trust in govern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3), 973-988.
- Converse, P. E. (1972). Change 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In A. Campbell & P. E. Converse (Eds.), *The human meaning of social change* (pp. 263-337).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Craig, S. C., & Maggiotto, M. A. (1982). Measuring political efficacy. *Political Methodology*, 8, 85-109.
- Easton, D. (1975).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suppor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4), 435-457.
- Ellison, N., Steinfield, C., & Lampe, C. (2007). The benefits of Facebook 'friend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 1143-1168.
- Eveland, W. P., & Scheufele, D. A. (2000). Connecting news media use with gaps in knowledge &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7(3), 215-237.

- Folger, R. (1986). Rethinking equity theory: A referent cognitions model. In H. W. Bierhoff, R. L. Cohen, & J. Greenberg (Eds.) *Justice in social relations* (pp. 145-62). New York: Plenum.
- Gambetta, D. (ed.) (1988).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on relations*. Oxford: Basil Balackwell.
- Gamson, W. A. (1968). *Power & discontent*. Homewood, IL: Dorsey Press.
- Gamson, W. A. (1971). Political trust and its ramifications. In G. Abcarian, & J. W. Soule (Eds.), *Social psychology and political behavior* (pp. 41-55). Columbus, OH: Charles E. Merrill.
- Hetherington, M. J.(1998).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4), 791-808.
- Hooghe, M., & Marien, S. (2013).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political trust and form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Europe. *European Societies*, 15(1), 131-152.
- Johnson, T. J., & Kaye, B. K. (1998). Cruising is believing? Comparing media and traditional sources on media credibility measure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5, 325-340.
- Johnson, T. J., & Kaye, B. K. (2003). A boom or bust for democracy? How the Internet influences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8(3): 9-34.
- Johnson, T. J., & Kaye, B. K., & Kim, D. (2010). Creating a web trust and change: Testing the Gamson hypothesis on political interested internet users. *Atlant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8(5), 259-279.
- Johnson, T. J., & Kaye, B. K. (2013). Putting out fire with gasoline: Gamson hypothesis, political information and political activity.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7(4), 456-481.
- Jung, N., Kim, Y., & Gil de Zúñiga, H. (2011). The mediating role of knowledge and efficacy in the effects of communication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4, 407-430.

- Katsanidou, A., & Eder, C. (2015). Vote, party or protest: The influence of confidence i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n various mod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Europe.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online first.
- Kaye, B. K., & Johnson, T. J. (2002). Online and in the know: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of the Web for political informat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6(1), 54-71.
- Kenski, K., & Stroud, N. J. (2006). Connections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political efficacy,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0(2), 173-192.
- Klandermans, B. (1997).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test*. Oxford: Blackwell.
- Kushin, M. J., & Yamamoto, M. (2010). Did social media really matter?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social media and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in the 2008 election.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3, 608-630.
- Lasswell, H. D. (1948).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In L. Bryson (Ed.),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A series of addresses* (pp. 37-51). New York, NY: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and Social Studies.
- Lee, K. M. (2006). Effects of Internet use on college students' political efficacy. *Cyber Psychology & Behavior*, 9(4), 415-422.
- McLeod, J. M., Guo, Z., Steele, C. A., Huang, H., Horowitz, H., & Chen, H. (1996). The impact of traditional & nontraditional media forms in the 1992 presidential elect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3(2), 401-416.
- Miller, A. H. (1974). Political issues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1964-197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3), 951-72.
- Mishler, W., & Rose, R. (1997). Trust, distrust, and skepticism: Popular evaluations of civi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 59(2), 418-451.
- Nisbet, M. C., & Scheufele, D. A. (2004). Political talk as a catalyst for online citizenship.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1(4), 877-896.

- Norris, P. (ed.) (1999).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ige, J. M. (1971).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rio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5), 810-820.
- Pasek, J., M., & Romer, D. (2009). Realizing the social internet?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meets offline civic engagement.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6(3/4), 197-215.
- Robinson, J. P., & Levy, M. R. (1986).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news comprehens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0(2), 160-175.
- Rosenstone, S. J., & Hansen, J. M. (1993).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NY: MacMillan.
- Scheufele, D. A., & Nisbet, M. C. (2002). Being a citizen online: New opportunities & dead ends.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 Politics*, 3(2), 1-4.
- Sweetser, K. D., & Kaid, L. L. (2008). Stealth soapboxes: Political information efficacy, cynicism and uses of celebrity web logs among readers. *New Media & Society*, 10(1), 67-91.
- Tian, Y. (2011).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as mediators: Examining links between political orient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59, 380-394.
- Towner, T., & Dulio, D. A. (2011). The web 2.0 election: Does the online media matter?. *Journal of Political Marketing*, 10, 165-188.
- Valenzuela, S. (2013). Unpacking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for protest behavior: The roles of information, opinion expression, and activism.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7(7), 920-942.
- Van Stekelenburg, J., & Klandermans, B. (2013).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test. *Current Sociology*, 67(5-6), 886-905.
- Wolfstfeld, G. (1986). Political action repertoires: The role of efficac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9, 104-129.

- Gil de Zúñiga, H., Molyneux, L., & Zheng, P. (2014). Social media, political express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anel analysis of lagged and concurrent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4(4), 612-634.
- Zhang, W., Johnson, T. J., Seltzerand, T., & Bichard, S. (2010). The revolution will be networke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on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8(1), 75-92.

**Dissidents or Alienateds?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aiwanese
Internet Users**

Song-In Wang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olitical efficacy and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which are the political attitudes defined by the Gamson Typology - Assured, Dissident, Subordinated, and Alienated.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he four groups differ in terms of conventional and non-conven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o what degree the use of traditional and alternative sources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 predicts the four groups. The results show that of the 1,470 Taiwanese Internet users who reported either high or low levels of trust and efficacy, 525 (35.7%) are classified as Alienated, 380 (25.8 %) as Assured, 328(22.3%) as Dissidents, and 238 (16.2%) as Subordinated. The four group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party identification. Findings also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compared to the other groups, the Dissi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protest against the government, the Assured are most likely to engage in political activity, and the Alienated are least likely to engage in political activity.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use of alternative sources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one to be either the Assured or the Alienated.

Keywords: political trust, political efficac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ternet users